

名士黄秉维

■本报记者 郝俊

2013年2月1日,是中国现代地理学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先生的百年诞辰。

对地理学界之外的大多数人而言,黄秉维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今日校园中修习地理专业的年轻学子,恐怕也只会与这位前辈偶尔相遇,其人其事则不甚了了。

幸而人们保留着一种特别的习惯,总会于诸如十年、百年为周期的时间节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之外,唤醒自己去回望历史深处的记忆。

在诸多纪念文字中,黄秉维被誉为“一代宗师”、“泰斗巨星”,是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面旗帜”。

然而,在黄秉维生前自述中,他却说自己“本应有尺寸之成,事实上竟如衔石填海,徒劳无功”,“60多年勤勤恳恳,而碌碌鲜成,又由于偶然机会,忝负虚名。偶念及此,常深感不安”。

无怪乎,亲人、友朋、弟子、同事等曾与黄秉维相伴相处之人,皆赞其“虚怀若谷”、“高山仰止”,甚至说他“给人白云仙鹤”之感,后辈难有企及者。两相对照,其实并非黄秉维过分自谦,也并非后人追星捧月,而是正如另一位地理学大师任美镔“忆秉维同志”时所言,他是有些“名士”派风度之人。

探大地之理

受五四运动“科学救国”思想之感召,幼时饱读孔孟之书的黄秉维于15岁考入中山大学理科预科,本打算毕业后专攻化学。

当时的中国,内乱外侮不断,看到报载国外科学家在中华大地考察探险,采集大量标本等消息,黄秉维痛感国人失职于祖国河山,遂放弃化学,本科改入中山大学新建地理系,从此在地理学园地耕耘一生。

地理是一门古老学科,以《水经注》、《山海经》、《徐霞客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曾成为世界地理文化之瑰宝。尽管中国地理早已自成体系,但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理也只是以一种描述性理论,与科学之范式相去甚远。

中科院院士刘东生曾回忆,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他第一次听到黄秉维的名字,得知其写过一篇文章记录《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的植物学问题,深感惊奇。本以为徐霞客只是个善写风景的文学家,怎会涉及科学问题?他隐隐感觉到,这是一项从近代西方地球科学出发,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科学的新奇工作。

其实,黄秉维所思并不仅限于此:“我国幅员广大……地理未经研究之面积,实尤其多。吾人即此研修,宜可根据所得之客观事实,于地理思想与地理方法,别有发明,别有创立,欧美之精华固可撮采,但不必囿于成说,自沮进步。”

不囿于成说,是黄秉维入科学之门所秉承的真谛。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与当时已声名卓著的李四光一起考察庐山冰川地貌,两人“几无一致见解”。面对后生的反对和怀疑,李四光依然非常客气,容得百家之言的气度令黄秉维深感敬佩,对他产生极大影响。

1934年,黄秉维写出《山东海岸地形初步研究报告》和《山东海岸地形研究》,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 Richtshofen)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属上升性质的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首次给出山东海岸下沉的证据。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否定外国人的学术思想。”作为黄秉维的学术秘书,曾跟随其工作三十余载的杨勤业评价道。

这也并非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黄秉维所坚

黄秉维(1913年2月1日~2000年12月8日)广东惠阳淡水人。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所)专员、研究委员、专门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科院地学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持一生的学术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当时对森林作用的片面认识,“森林万能”说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有西南某省委提出大搞“绿色水库”。黄秉维秉笔直书《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和《再谈森林的作用》等文,呼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国家重视。

晚年谈及此事,黄秉维说:“确切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往往可以离开这个‘确切’。因为知识有限,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当做真理,这样的话要犯错误。”这一席话,今日听来仍振聋发聩。

筑学科基业

基于“科学救国”的思想,黄秉维早期的地理工作多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自然区划标准在全球范围得到较多沿用,然而它并不适合中国复杂的气候地理条件。基于多次实地考察,黄秉维编著而成的《中国地理》,对我国气候、土壤、植被、地貌等相互关系,首次作出较为系统、详尽的介绍。

此后,黄秉维发表的《中国之植被区域》和《中国之气候区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区划重要成果。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问题始终在黄秉维头脑中挥之不去。国际学界已经认识到“地理学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能耕得深又耕得广”,那么地理学究竟前景如何?

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家建设需要,我国地理学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邀黄秉维筹建地理研究所,出任所长一职。他则在最初的复信中表示“断然”不予考虑,在此背后,黄秉维经历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思想斗争。

当时,黄秉维意识到地理学需要“扬弃肤浅的东西”走向综合,改变传统地理学偏重于描述、

无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弱点,但“没有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知识,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便难有发展前景。然而,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而言,无疑困难重重。

竺可桢却认为,除黄秉维之外,“另外物色极不易”。他首推黄秉维的理由有三:一是要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有较高的学术威望;二是不涉及当时地理学界的宗派纷争,科学院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火车头,一个所长必须是众望所归,能被南北的地理学家所接受;三是和国民党没有干系。

在地理所筹委会委员众推之下,黄秉维最终同意离开当时所任职的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到地理所就职迎接挑战。

“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黄秉维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他的核心学术思想。面对地理学落后和地理研究所如何解决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困难,他开始了构筑学科发展基础的工作。

1956年~1959年期间,黄秉维提出自然地理学的三个研究方向,即:地表热量和水分平衡;化学元素迁移和转换;生物群落与环境间的物质、能量交换。

“中国地理学界沿着黄先生设定的研究方向,走上了世界相关科技领域的前沿。上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相继出现了国际水文十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变化、荒漠化等重大科学计划或国际议题。中国地理学界并不陌生,而是能从从容应对,始终在中国的生态、资源、环境、发展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黄秉维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唐登银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则评价道:“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自然地理学深化过程研究,建立地理过程观测研究野外台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开展的地理格局—过程—尺度相互作用的耦合研究就是对黄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

扬光大。”

1984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委员会向国际科学联合会提出的报告曾指出:要了解全球变化中的主要问题,必须将互相联系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综合起来。

无疑,这与1956年黄秉维提出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不谋而合。我国地理学界相关研究比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变化中开展类似的研究早了近30年。

然而在晚年,黄秉维谈起这“早30年”之说却不无遗憾,感到自己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工作“进展很慢”,说“时间花了,力量花了,最后却没有结果,这个责任在我”。

“假使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应该能够望风使舵,知道水流的深浅,鱼网应该撒向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一贯苛责自己的黄秉维说,“书生气十足的人真正创业是很困难的。”

今日的地理学界同仁,却将永远铭记并感谢黄秉维的奠基性贡献。唐登银相信:“如果自然地理学停留在事实和现象的机械叠加,停留在肤浅的定性描述,面对复杂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将束手无策,那么与相关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将处于弱势。”

留一世风范

黄秉维自称书生气十足,在旁人眼中,他也是公认的嗜书如命之人。博览群书,广闻天下,这与他的综合地理学思想一脉相承。

古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也恰是对黄秉维一生酷爱书卷的真实写照。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生前与黄秉维共事六十余年,两人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通电话,所不同的是,陈述彭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而黄秉维则是彻夜看书至天明。真可谓“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

青灯黄卷,黄秉维习惯于通宵达旦地读书,且走到哪儿读到哪儿,无论出差、开会还是野外考察,总要随身背着一包书。他也由此得了一个雅号,叫做“两条腿的书架子”。

如黄秉维儿女所言,这一幽默的“尊称”中还有另一层含义:“父亲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与他的交往中,仿佛可以漫步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从中获取知识和人生的真谛。”

黄秉维讲求博学深研,也并不讳言自己“好学多思,勤奋不懈,寻求真理,锲而不舍”,然而回望来路,却总称自己“劳而无功”。

作为黄秉维的第一代门徒,地理学家施雅风将恩师所谓的“劳而无功”,归结为他幼年读书时形成的“不慕名利”的“隐逸”思想,并且认为他对“详尽、彻底、系统、深入”的极端追求,多少影响了他的著书立说之效率。

1989年夏,地理所成立《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拟将其学术论著集结出版。然而黄秉维本人却对其文集的编辑大加挑剔,一再说过去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

几经同事劝说,文集之事才最终得到黄秉维的默许。即将付梓之际,黄秉维为文集撰写3万余字的“自述”和“自序”,并希望在书名中加入“教训与体会”几个字。编辑组坚持认为,这几个字不宜用作书名,提出可在书中加以说明后,黄秉维才勉强同意。

除了自始至终对待学问的严谨和认真,黄秉维的这些选择,也的确是他人生的现实体现。

改革开放之初,黄秉维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数年后,他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

“有很多事是我不了解也不懂的,我怎么去支持和反对?”黄秉维向儿女们道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在黄秉维儿女的心中,虽然也曾历经了知识分子改造之磨难,但他们的父亲没有成为“政治陪都式”的人物,而是始终保持了学者的良知和求实的风范。

这或许也是任美镔先生所言,黄秉维颇具“名士”派风度的原因之一吧。

“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生于民国初,历经家国罹难、世事动荡,献毕生心血于学问不求闻达,黄秉维的身上,有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后的魏晋风骨。

人物短评

黄秉维先生曾手书:“行所当然而不惑于偶然”,这生动地体现在他本人的科研生涯中。他学识渊博,善于独立思考;他一丝不苟,治学严谨;他营造宽松氛围,鼓励学术争鸣;他启发引导,提携后学;他探索求是,坚持真理;他结合实践,服务国家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

黄秉维院士是我国地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伟大思想家与设计大师。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深思熟虑地指点学科方向,在学科发展上是我们的舵手。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

由于长时期高速和超高速增长以及大规模城市化,我国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向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和实际问题。紧紧把握黄先生的教导,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

我在先生身边工作逾37载。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为国家、为人民的崇高信念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血液中,体现在他所主持的每一项任务中,他所完成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一切为了国家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

——黄秉生前学术秘书杨勤业

师从黄先生40多年,先生的爱国敬业、尽职尽责、博学多思、高瞻远瞩、学理深究、学术创新,以及宽厚待人、勤勉淡泊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奋勇前进,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遗产。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谭建安

“生态环境”一词是黄先生提出的,曾被引入政府工作报告,后来他一再讲生态和环境两个专业名词不宜叠加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名词出发,而是当做“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那样更广泛的理解,那么“生态环境”一词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丕远

Senior 先生

“回忆这东西西是有气味的,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萧条异代不同时

■么辰



1954年摄于香港兰心照相馆,30年后张爱玲在其背后题诗:“怅望荆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有人说,阿拉伯数字0代表一个人的一生,兜兜转转一个圈,最后终点又回到起点,其间纵是经历无数的灯火繁华抑或荒烟蔓草,遇见无尽的峥嵘男子抑或窈窕美人,结局还是虚无。

张爱玲的一生足够传奇,李昂说:“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她书里有葛薇龙那种贵妇人的穷亲戚,有虞家茵、顾曼桢那样被命运捉弄苦了的寻常女子,有曹七巧、银娣那样被判终身囚在金锁里的怨妇,有霓喜、罗文涛那样一生陷在循环往复的厄境中的无助者,有小艾、金香、丁阿小一类的贱仆,也不乏月香、黄娟、郑川嫦那样一辈子忧世伤生的可怜人——张爱玲的一生亲历了大时代的沧桑巨变、人世浮沉,她的一支笔千娇百媚,落下的却都是朵云轩信笺上的一颗颗粉泪。

传奇纵然未完,但是结果也不过是终点又回到了原点。到了所谓晚年的时候,有关张爱玲的一些事和她写的作品都照应了她早岁的过往,像是她终生嗜好的中国旧小说一样,埋于前面的伏笔在伏延千里之后还是能接上上文,草蛇灰线没有断。

《我的天才梦》和《忆〈西风〉》

1939年,还在港大求学的张爱玲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纪念日征文,那年她19岁。比赛为命题作文,题目为《我的……》,文章写得极短,她把自己那种天才式的敏感和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些事和她写的作品都照应了她早岁的过往,像是她终生嗜好的中国旧小说一样,埋于前面的伏笔在伏延千里之后还是能接上上文,草蛇灰线没有断。

篇获奖感言,题名《忆〈西风〉》,发表在《中国时报·人间》,这种获奖感言都是命题兼应景之作,不得不写亦不可再写,以张爱玲的性格,这种文章她是决不爱碰的。

文章在例行的感谢之后,提到了那段自己念念不忘、心有不甘的往事。她回忆说当年获得头奖的《我的妻》大大超过了字数限制,长达三千余字,写的故事内容近于鲁迅写的《伤逝》。张爱玲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西风》始终没提为什么不计字数、破格录取”,她回忆说好像有个人用得着那笔奖金,所以《西风》内定把奖给他。

到底是张爱玲,一篇获奖感言都写得格外精彩。《忆〈西风〉》中说:“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7个月之后,张爱玲离开人世,形容一件自己早已不记得但曾经记得过的事情为“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是张爱玲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精彩的譬喻。

多年之后,有赖陈子善教授的挖掘,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特为此事翻查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三十七期刊出的《〈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当年的原刊上面白纸黑字写的征文限定字数为“五千字以内”,是张爱玲自己看错了字数(更可能是后来记错了)才把文章写得这样短,隔了半个多世纪还是不能释怀。

另外,《我的天才梦》一文获得的不是第十三名荣誉奖,而是名誉奖第三名,原定奖额十个,但“因精彩文章实在太多”,《西风》杂志决定另增三个名誉奖,张爱玲获得的即是这个名誉奖第三

名,《忆〈西风〉》里的叙述再次有误。

《我的天才梦》是张爱玲初涉文坛之作,一上阵就有风华绝代的架势,而《忆〈西风〉》是她告别文坛的绝笔,过人的才情和简洁华丽的文笔怎是一个“老道深厚”可以概括得了?在张爱玲的生命中,二者遥遥相望,就像是她写的那些绝对精彩的小说一样,开首和结尾都同样超绝,而且意味吻合。

《不幸的她》和《小团圆》

张爱玲的小说处女作为《不幸的她》,那年她12岁,发表在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风藻》第十二期。12岁发表短篇小说对于张爱玲来说好像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她7岁时就写了第一部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要去向家里的厨子怎样写。《不幸的她》写的是一对少女时代的闺蜜,一个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漂泊四方,一个自由恋爱而过了上幸福的生活,10年后二者重逢,“不幸的她”悄然离去,因“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凄清”!

不知道是不是10岁报名读黄氏小学临时改名字为“张爱玲”的一语成谶,更可能是张爱玲命定的一种哀愁和荒凉,或者按照她的说法,张爱玲小时候在私塾里面常因为背不出书而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她后来写的小说多是灰暗的,在灰暗的背景色里演绎着一个精彩的人生悲剧。她好像就是不喜欢圆满的结局,对人生亦充满了不信任和无处不在的冷漠,这种冷漠有时是惊人的。

像是《小团圆》中写盛九莉为了要和邵之雍在一起,竟然希望二战永远不要结束,而九莉在

睡梦中听到外面放起鞭炮,原来是日本投降了,她也只是翻了个身子继续睡觉。这部《小团圆》是张爱玲生命中最后的一部小说,虽然一直未能写完,但也算是一部完整之作。全书写尽了张爱玲生命中的种种纠结之事,包括和自己、父母、炎樱、胡兰成、桑弧、赖雅、亲戚族里等人的纠结难解。这些人生的困扰早已超越了当年《不幸的她》中的那种云泥之感,然而即便如此,在张爱玲的行文中,还是不带一丝一毫对于人生的怜悯,依旧保持着她12岁时那种怀疑一切、冷眼旁观式的决绝。

《小团圆》的开头和结尾是一段完全一样的话,都是描写大考的早晨,而《不幸的她》的结尾也是一段和开头类似的话,《小团圆》中的盛九莉是不幸的,亦如《不幸的她》中的“她”,人生的不幸和大考的命运贯穿了张爱玲的一生,在她的处女作和生命终篇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4年,张爱玲时在香港英皇道,邝文美陪她去一家照相馆照相。1984年,在洛杉矶搬家整理行李时,她无意之中发现一张印有兰心照相馆署名和日期的照片,原来正是摄于整整30年前的那张旧照,不禁自题“怅望荆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诗倒是其一生的写照,不管经历过了多少繁复急管或是急管哀弦,到头来仔细端详,其实都是一样的急急调调。

最喜欢张爱玲写下的这段话:“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回望整个中国文学史,张爱玲可谓有不世出的超人才华,她用一生时间画的这个0只是比寻常人更加百转千回,回肠荡气罢了,即使不过还是0。